

湖湘

主編 方克立 陳代湘 (執行)

湘學史

①

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庫



主编 方克立 陈代湘(执行)

# 湘学史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湘文库  
乙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学史 / 主编方克立, 陈代湘(执行).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38-4941-9

I. 湘… II. ①方… ②陈… III. 哲学流派—哲学史—湖  
南省 IV. I209.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5052号



湖湘文库(乙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 湘学史 (共2册)

著 者 方克立 陈代湘(执行) 主编  
责任编辑 彭富强 穆陵宁 郭平 张人石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222673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79  
字 数 897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4941-9  
全 套 定 价 236.00元

ISBN 978-7-5438-4941-9



9 787543 849419 >



## 第十章 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湘学的开端

由北宋周敦颐肇始，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大成的古代湘学，发展到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实现了向近代的转型。湘学的近代转型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古代封建主义文化的冲突，而近代湘学正是调适两者的产物。陶澍、贺长龄等晚清湖湘经世派的出现是近代湘学开端的标志，而魏源的经世理论与实践则标志近代湘学的形成。

### 第一节 近代湘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古代封建主义文化的冲突导致湘学向近代转型。所谓“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整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观念体系作为人们寻求“意义”、“价值”的基础，这种“意义”、“价值”是人们相互理解、沟通、交流和评价的工具。差异性和可传递性是文化的两个基本特点。环境的隔绝，会导致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文化发展体现出差异性。而人类凭借远比动物发达的信息传递手段，一种文化能在一片辽阔的领域顺利传递。文化的差异性和可传递性是导致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

明代中叶以前，中国以其比较发达的文化居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虽然也与外国有过文化交流，但基本上是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几乎没有外来文化严重冲击中国文化、让中国人反省中华文化的经历。可以这样说，明代以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几乎是“以夏变夷”而非“以夷变夏”的历史。而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的中国便渐渐落后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各国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工业革命更是使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伴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欧洲列强不断向海外扩张，通过武力迫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落后国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商品。

与此相反，当时的清朝统治已由强盛走向衰退，危机四伏。一方面，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里，阶级矛盾激化，无法生存的农民被迫揭竿而起，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严重地威胁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经济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双重夹击，中国封建自然经济以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走向解体。而昏庸的满清统治者不顾时势，因循守旧，继续奉行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与外国包括西方列强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他们视近代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为了维护其狭隘的阶级私利，他们人为地设置了西方文化教育在中国传播和交流的障碍，造成了科学不被重视、进步遇到阻碍、商业因人们轻视而备受抑制的局面，从而为尔后的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埋下了隐患与祸根。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以倾销产品和掠夺原材料，英国侵略者于1840年发动了鸦

片战争，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堂堂天朝上国败于“蕞尔岛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的一款重要内容就是迫使清政府开放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等五城市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的商品在这些城市销售，关闭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国门终于被英国殖民者打开。

中国人由于几千年的辉煌文化和长期的封闭状态而形成了一种自大的传统观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礼仪之邦，其他民族和国家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中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不堪一击的无用之邦。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思想已深深地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扎下了根。虽然孔子、孟子所说的“夷”指的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而非西方国家，但近代中国人与他们的先辈同样对其他文化抱有偏见，对外来文化总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形成了盲目排外的心理和思想。当英国侵略者以坚船利炮的铁血方式粗暴地叩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时，满清统治者、士人深深感到古老的中华帝国遇到了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强烈的抵触态度，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由此拉开序幕。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即封建主义文化的冲突是由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的差异和矛盾引起的。那么，这两种文化有哪些差异呢？对此问题的解答可谓见仁见智。严复是首位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比较全面解答的学者。在他看来，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历史观的不同。他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

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其次是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sup>①</sup>再次是伦理道德的不同。用严复的话说就是“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最后是学校教育内容不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内容反映了工业革命的成果，格致之学即自然科学是其主要内容。而中国的旧式学堂——私塾——教学的内容是考据、辞章和义理之学，以注解儒家经典为主要任务。我们认为中西文化的冲突、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为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二是封建君主专制和近代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体制的冲突。三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冲突。四是旧式科举教育与新式学校教育的冲突。

当这两种充斥了对抗性质的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相遇时必然产生强烈的碰撞，并带来了两种结果：一方面，二者文化上质的差异加大了中西双方沟通渠道的负荷，使得冲突越来越剧烈，西方列强通过一次次“血与火”的战争方式，迫使封建的中国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上的排他性和多次冲突中己方的失败，使得觉醒了的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虽然从理性上强迫自己适应西方文化，而在情感上始终难以释怀，西方文化只能在理性和情感的矛盾中渐渐融入他们的思想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文化由激烈的冲突经过整合渐至融合，其标志便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折衷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等四种整合中西

<sup>①</sup> 《严复文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文化冲突价值选择模式的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文化保守主义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传统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最初的本能反应模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优于其他文化，近代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近代前期，文化保守主义体现出极端的保守特征，顽固地坚持传统文化本位立场，否定对任何西方文化包括物质文明的接纳。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西方近代科技成果斥责为奇技淫巧，一概拒绝。近代后期，文化保守主义则表现为一种国粹主义思潮和复古倾向。与近代前期的保守主义思潮相比，只是在一个方面有所进步，即承认西方在器物层面已超过中国，但否认西方文化在文化、伦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在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远远优于西方近代文化。由于当时的西方文化已是一种强势文化，必然会向弱势文化地区扩张。当扩张遇到抵抗时，就会以武力强迫弱势文化接受。在西方文化铁血方式的冲击下，这种主张很快败下阵来，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折衷主义。

文化折衷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文化的最初形态。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教育等精神文明优于西方文明，只是物质文明不如人，因而主张“中体西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原则，而以西方文化为具体方法。换言之，固守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纲常伦理和教育制度，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也就是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文化折衷主义在中国近代很有市场，地主阶级改革派、早期资产阶级改革派、洋务派都持这一立场，前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实际上蕴涵了“中体西用”的萌芽。这一命题就是主张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而中国



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政治制度优于西方，不必向西方学习。任何事物都是体用的统一，有其体，才有其用；有其用，则必有其体。“中体西用”论割裂了“体”与“用”的统一，是自相矛盾的主张。

文化虚无主义主张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已成落伍的过时文化；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中国文化的未来就是西方文化，因而主张全盘西化。文化虚无主义无视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合理性，都有着精华和糟粕，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合理因素的存在，否认西方近代文化糟粕的存在，割断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中西文化整合观。正因为如此，当这种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胡适、吴虞等人提出后，很快就遭到了批判，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综合创新主义。

文化综合创新主义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缺点，主张吸收两种文化的优点，摈弃其缺点，从而建立一种新文化的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如何应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仍然是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为整合中西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这就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既主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民族性，又强调吸纳西方文化的科学而具有时代性。应当说，这是一种科学的，也能够为中国人的情感所接受的整合中西文化冲突的价值选择模式。正因为如此，它成为长期指导人们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工具。

严格地说，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一味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拒斥西方近代文化，还谈不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整合中西文化冲突是从文化折衷主义开始的。而文化

折衷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实质上是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因此，魏源实际上是首位提出怎样整合中西文化冲突的先进知识分子。

清朝的衰落在乾隆末年初现端倪，嘉庆时期江河日下，道光年代则大厦将倾。清政府的部分地方官员和士子苦苦思索造成这种严酷局面的原因，并力图寻找答案。而以陶澍为核心，以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汤鹏、邓显鹤、唐鉴、刘蓉等为骨干的湘籍官员和士子充当了这一探索的先驱和主力。在他们看来，清代由盛转衰是因空疏无实用的学风造成的，要改变这一局面，应推行能经邦济世的实学，使研究学问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上述官员和士子学术旨趣相同，都提倡、力行经世实用，且皆为湖南人，因而被冠以晚清湖湘经世派的称谓。晚清湖湘经世派是推动古代湘学向近代湘学转型的载体，陶澍、贺长龄等人的经世理念和经世实践为湘学向近代转型作了准备，魏源的经世理论和经世事功则实现了湘学的近代转型。之所以说经过上述官员和士子的经世理念的提出和经世事功的建立实现了湘学向近代转型，是因为此后湘学带上了明显的近代特点，其内涵与古代湘学有着质的差异。

## 第二节 陶澍、贺长龄的经世思想与实践

嘉庆、道光年间，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为振兴国家，部分开明官员、知识分子重提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清初思想家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形成了以陶澍为首，贺长龄、贺熙龄等人为核

心的湖湘经世派。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晋大司马陶侃之后；18岁参加县试，得补邑诸生；22岁参加湖南乡试，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主考、御史、道员、给事中等京官；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出任川东兵备道；道光主政后，陶澍得到重用，先后任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年）升任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兼理两淮盐政，卒于任上；是权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一代名臣。陶澍著有奏疏67卷、诗文56卷，另有大量日记。

612

贺长龄（1784—1848），字耦耕，晚年自号耐庵，又号啮缺叟，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6岁时应童子试，获第一；嘉庆十一年（1806年）入岳麓书院受业于罗鸿胪；嘉庆十二年（1807年）参加湖南乡试，以第一名的身份中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广西乡试副考官、山西学政、江西南昌府知府、山东兖沂曹济道、山东按察使、广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福建布政使、直隶布政使、贵州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故里，享年64岁。著有《耐庵奏议存稿》、《耐庵公牍存稿》、《耐庵文存》等。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的治学原则之一。所谓经世就是经邦济世，致用就是指学术研究应当为治理世事服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应能指导实践，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经世致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通经致用，在汉代曾盛极一时，何休阐发的公羊春秋学就强调从治经中引申出治理政事的原则。满清政权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他们反省了明代亡国的

原因，就是宋学的清淡无实和汉学的繁琐考据无用。正是基于这一反省，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重提经世致用之学，于明清鼎革之际掀起了一股实学思潮。满清王朝从康熙时期起就注意对汉族学人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以杜绝借学术影射、干涉政治的局面出现。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儒生们的治学路径便只能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于是汉学、宋学盛行。嘉道之际，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在湖湘名臣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的提倡、践行下蔚然成风，湖湘经世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湖湘经世派的形成是时代的产物，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其一，社会的深刻危机激发开明的封建官僚、知识分子匡时济世，通过改革寻找出路。其二，乾嘉汉学与宋学的日渐衰落促使开明的官僚、知识分子将关注的重心从故纸堆中、无实无用的义理中转移到社会现实中来。其三，理学经世和今文经学的复兴为改革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议政工具。其四，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清王朝再也无力像康乾时期那样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放松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正是有感于嘉道之际空虚学风带来的危害，陶澍从理论上倡导经世之学。他的经世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强调经世实学的重要性。他在《〈庚午科四川乡试录〉序》中指出：“经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术明，则人才蔚起。其深者，渐摩浸润，密移于性命之际，发为文词，必充实光辉，粹然一衷于道。由是建之设施，则通经致用，亦经正而庶民兴。所谓文章，莫大乎是，而时代升降之说，不足言也。”其二，鄙视空疏、脱离实际的宋学和汉学。在他看来后世学术之所以不如古代学术，就在于：“后世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

于实用，学术之所以不能如古，盖在是矣。”<sup>①</sup>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理学经世派，陶澍并非一概排斥宋学和汉学，撰写了不少考据方面的著作；他鄙视的只是空疏、脱离实际的宋学和汉学。其三，力倡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经世实学。“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非是，则五石之匏，非不枵然大也，其中乃一无所有。以中无所有之人，即幸邀有司一日之知，责其实用，难矣哉！”<sup>②</sup>他把研究经史作为致用的工具，主张“言为有物、学为有用”。<sup>③</sup>其四，主张正视现实、重视现实、关心时政，提倡改革更法，兴利除弊。陶澍逝世后，魏源在为其撰写的《行状》中谈到：“公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sup>④</sup>

漕务、盐务、河务是嘉、道时期最为棘手、弊端迭出的三大时政，陶澍的经世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革漕务，变漕粮河运为海运。

漕粮是我国封建时代由东南地区经水路运往京师的税粮。而漕运与漕粮是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指经由水路向京师地区运送税粮。我国的封建王朝大部分建都北方，因而漕粮主要是由盛产粮食的东南地区运往北方地区。清朝每年要从东南各省通过大运河等河道向北京运输漕粮400万石左右，以保障皇室、官员和军队的用粮。漕运是清朝的生命线，是维持朝廷正常运转的基础。至道光、嘉庆年间，漕运积弊丛生，漕司衙门冗员充斥，效率低下；吏治腐败，层层盘剥，浮费日甚。漕臣、漕卒和社会上的不法之

①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3页。

②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9页。

③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7页。

④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40页。

徒内外勾结，弄虚作假，夹带私货，盗卖漕粮；大运河等河道淤塞不通，隔一段时间就需花大量的经费疏浚。上述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导致漕运十分困难，运费数十倍于粮价，严重威胁了清王朝的正常运转。道光四年（1824），淮河在高家堰决口，运河枯涸，漕运中断，当年的400万石漕粮无法北运，致使朝廷震动，当事地方官员焦虑。清廷于道光五年（1825）急调陶澍为江苏巡抚，负责漕务的整顿与改革。在道光帝的支持和魏源的筹划、协助下，陶澍与布政使贺长龄一道着手对漕务的改革。

陶澍对漕务的改革主要是改东南沿海地区的漕粮河运为海运，变官运为商运。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主张漕粮“当以海河并运为宜……大抵专办海运，则恐商船之不足，专办河运，又恐清水之难恃。惟有两者相辅而行，可期无误”<sup>①</sup>。具体方案是江苏省之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的160万石漕粮改为海运。他于1826年初赴上海考察海运事宜，包括制定海运政策，招募海运商船，确定海运路线，征集海运税粮，选派押运官兵，组织、保护商船往返，并派员到天津办理收粮事务。经过精心准备，至六月五日，“计海船一千五百六十三号，装兑苏藩司所属四府一州额漕正耗米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由吴淞出崇明、佘山，北放大洋，趋成山，转之罘，以达天津。水程四千余里，往返两次，不爽时日。屡遇风暴，履险如夷。间有松舱抛失耗米，为数共止八百余石，不及全运米千分之一”。<sup>②</sup>清廷重臣、尚书穆彰阿在天津验收时认为“米色率莹洁，过河运数倍”<sup>③</sup>。漕粮海运不但运时短、米质优良，而且降低了运价，铲除了腐败，更有利于海商。

①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99页。

② 陈文述：《海运续议》，《皇朝经世文续编》第四十九卷，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③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42页。

因为，“海商运漕而北，载豆而南，两次得价”<sup>①</sup>。江苏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由官运改为商运，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清王朝革去了一大弊政。清廷对漕粮海运成功予以肯定，从1827年起，便成为定制。

其二，改革盐政，实行票盐制度。

食盐税收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道光时每年达750万两白银，约占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20%。食盐税收中，淮盐比重最大，每年达300万两白银。清沿明制，实行“纲盐法”。所谓“纲盐法”是指盐商交纳包括税金在内的盐价款，领取盐引（引为我国宋代以后食盐的计量单位，每引规定的斤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尽相同，大约为400斤左右）作为运销食盐的凭证。盐局将每年各盐商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入纲册，每纲食盐固定配额和销售地区。凡是编入了纲册的盐商称为“纲商”，永远有权运销食盐，且食盐的这种专卖权可世袭；未入“纲册”者，则不能运销食盐。这种僵化的销售体制和专卖特权结合在一起，势必导致食盐运销弊端丛生。从雍正时期起，盐政弊端日甚一日：盐业管理部门和各级官员对盐商实行无休止的摊派、勒索；纲商、总商又竭力压榨运商；食盐运、销两难，食盐严重积压；私盐种类繁多，泛滥成灾，严重冲击了食盐的正常运销；盐税严重拖欠。《清史稿》统计，到道光十年（1830），仅两淮盐场共积欠税银6300万两。正是意识到了盐政的弊端之重，清廷于道光十年升任陶澍为两江总督时，同时任命他兼任两淮（即淮南、淮北）盐政。陶澍兼任两淮盐政后，根据淮南、淮北两个盐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15条整顿盐务的章程，对两淮盐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sup>①</sup>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42页。

陶澍主要从以下方面对两淮盐政进行改革：一是裁浮费以降低食盐成本。两淮盐务，盐商除交正课外，还需向盐场、盐政管理衙门交纳多种费用，这些浮费几乎与正课相当，导致食盐成本成倍提高。为降低食盐成本，降低盐价，陶澍裁削了盐场、盐政衙门的管理费用。二是增加每引重量，道光时期的两淮盐场，原来每引为364斤，陶澍规定再加36斤，税收则不增加，以补贴盐商。三是疏浚运输渠道，在运送食盐的交通线上设置岸店，方便盐商，取消轮流运盐的轮规制度，盐商随到随销，调动了盐商的积极性。四是严格制度，确保食盐税银收入归国家所有。食盐税分正外两库，不许将正库的税银挪垫。对此，魏源在给陶澍写的行状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盐课入库，从前不分正杂，遇有紧解，百计那应。始则以帑本抵额课，迨帑本罄，则令商豫减纳，而以豫给印本抵课。迨商垫复穷，则又令其以印本贴息质贷，而以减贴额数，摊于后数纲，辗转葛藤，莫可究诘。又有总商管库，不行盐而专领费。甚至报销皆出库垫，冒支从不报销。公（陶澍）奏分二库，以正项入内库，专候部拨；以杂项贮外库，不许以正项那垫。革去总商管库，以杜侵渔。永禁印本减贴，以截虚抵，俾勿贻后患。”<sup>①</sup>五是整饬纪纲，加强稽查力度，不许官商勾结，不许欺压、勒索煮盐工人。

淮北盐场的经营情况更是糟糕。“北盐十载无课，遍地皆私，店闭商逃，岸悬引绌，皆由运道迂而成本重。”<sup>②</sup>对于淮北盐场，陶澍则实行彻底的改革，废除纲盐制，试行票盐制度。票盐制是指商人、私贩在纳税后，由盐业管理部门开具发票，商人、私贩凭发票就可从盐场买进食盐，然后运往外地销售。为确保票盐制

①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45页。

②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45页。



的顺利贯彻，还规定了盐税标准、运盐的路线和口岸；沿途设有厂局、岸店，方便盐商，又便于查验；废除陈规，禁止各衙门勒索盐商；严禁私设关卡，严惩刁徒、恶棍破坏，以保障食盐运输安全、畅通。之后，又根据票盐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了许多补充规定，给盐商以更多的方便和自由。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盐商的积极性，淮北盐场的食盐销售量大增，不但销售了当时生产的食盐，而且将多年的积压食盐也销售一空。淮北盐政改革的实质就是改纲盐为票盐，变官营为商营，行销体制灵活，政策便利商人，调动了盐商的积极性。

陶澍对两淮盐政的整顿和改革，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可从魏源对两淮盐政改革前后的经营情况的对比描述中得到说明：“公（陶澍）未受任以前，淮南以十载而行六纲，淮北以十载而行三纲。其每年奏销报解之银，一则全亏帑本七百余万，而以帑利贻患后来纳课之商；一则设立豫纳、减纳、贴息名色，寅支卯粮，以数十年后之课，豫亏之于数十年之前。以致旧商累倒，新商裹足。及至八年、十年间，则已无可那垫，无可借贷。遇报解，则库如悬罄；遇开纲，则止收空本。公（陶澍）承极弊之后，自道光十一年辛卯开纲，至戊戌卸任，两淮八载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而在岸缓纳之课尚不在其内。从无统纲借帑之事，库贮常实存三百余万两，几于年清年款。”<sup>①</sup>陶澍兼任两淮盐政八年，平均每年完成食盐税收330万两白银，为其任前每年平均120万两白银的近3倍，一年所收税银几乎相当于以往的3年。两淮盐业的经营情况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难局面，变成了“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旺景象。

<sup>①</sup> 《陶澍集》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45~646页。